

山西历史 与文化

杨秋梅 / 著

山西出版集团



三晋出版社



山西历史 与文化

杨秋梅 / 著



山西出版集团 三晋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山西历史与文化 / 杨秋梅著. — 太原: 三晋出版社, 2008.12

ISBN 978-7-80598-995-2

I. 山… II. 杨… III. ①山西省—地方史—研究②文化史—山西省—研究 IV. K29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30774 号

山西历史与文化

著 者: 杨秋梅

责任编辑: 吕文玲

出 版 者: 山西出版集团·三晋出版社

地 址: 太原市建设南路 21 号

邮 编: 030012

电 话: 0351—4922268(发行中心)

0351—4956036(综合办)

E-mail: sj@sxpmg.com

网 址: <http://sjs.sxpmg.com>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承 印 者: 太原市新华胶印厂

开 本: 850mm×1168mm 1/32

印 张: 9

字 数: 250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12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2 月 第 2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598-995-2

定 价: 18.00 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目 录

第一章 远古时代的文化遗存

- 第一节 旧石器时代 (1)
- 第二节 新石器时代 (9)
- 第三节 古史传说时代 (14)
- 第四节 夏商时代 (20)

第二章 称霸百年的晋国

- 第一节 晋国的建立与发展 (23)
- 第二节 晋国的强盛与称霸 (37)
- 第三节 晋国的衰落与三家分晋 (51)
- 第四节 晋国的经济与文化 (57)

第三章 列强争雄中的三晋诸国

- 第一节 天下莫强的魏国 (64)
- 第二节 中央之国的赵国 (76)
- 第三节 事微国小的韩国 (87)
- 第四节 三晋的社会经济 (92)
- 第五节 三晋的思想文化 (95)

第四章 秦汉时期的山西

- 第一节 秦时期 (105)
- 第二节 西汉时期 (109)
- 第三节 东汉时期 (119)

2 山西历史与文化

第四节	秦汉时期山西的经济与文化·····	(125)
-----	-------------------	-------

第五章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山西

第一节	魏晋时期·····	(130)
第二节	十六国时期·····	(140)
第三节	北魏的统一与盛衰·····	(146)
第四节	魏晋南北朝时期山西的文化成就·····	(156)

第六章 隋唐时期的山西

第一节	隋唐政治与山西·····	(170)
第二节	隋唐河东著姓·····	(184)
第三节	隋唐时期山西的社会经济·····	(190)
第四节	隋唐时期山西的文化成就·····	(193)

第七章 五代辽宋夏金元时期的山西

第一节	五代十国时期·····	(208)
第二节	宋辽对峙时期·····	(213)
第三节	金时期·····	(219)
第四节	元时期·····	(223)
第五节	五代辽宋夏金元时期山西的文化成就·····	(226)

第八章 明清时期的山西

第一节	明时期·····	(244)
第二节	清时期·····	(256)
第三节	明清时期山西的经济发展·····	(261)
第四节	明清时期山西的文化成就·····	(272)

第一章 远古时代的文化遗存

早在 180 万年前,山西这块土地上就繁衍、生息着中华民族的先祖,他们创造了绚丽多彩的远古文化,也为我们留下了大量内涵丰富、特征鲜明的文化遗存。从人类的出现到国家的产生,在这里形成了一个绵延不断且自成体系的文化发展序列。山西,不仅是中国远古人类文化的发祥地,更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源地,又因创立华夏文明的帝王黄帝、炎帝、尧、舜、禹的活动中心都在晋南,因而晋南又是“帝王所都”。

第一节 旧石器时代

旧石器时代是人类历史的最初阶段,与地质学上的第四纪更新世大致相当。这一时期,人类以打制石器为主要生产工具,过着采集和狩猎的原始经济生活,人类自身的体质演进也经历了猿人、古人、新人三个阶段。山西地区的旧石器文化遗址分布相当广泛,其数量多,文化内涵丰富,而且文化年代衔接,历史脉络清晰,形成了绵延不断的旧石器文化发展序列。这说明,在旷古而久远的旧石器时代,山西地区曾是中国原始人类繁衍生息的集中地带,也是我们民族的先民们最早开发的地区之一,“越来越多的材料证明山西是中国乃至东亚地区研究人类发

2 山西历史与文化

展的举足轻重的地区”^①。

山西地区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十分丰富,我们主要介绍在旧石器时代早、中、晚三个时期最具代表性的文化遗址及其文化面貌。

一、西侯度文化与匭河文化

1. 西侯度文化 西侯度遗址位于运城市芮城县风陵渡镇以北约10公里处的西侯度村一带,距今约180万年,地质时代为早更新世。这不但是迄今所知中国境内最古老的一处文化遗址,而且也是世界范围最古老的文化遗址之一。

西侯度遗址发现有大量的古脊椎动物化石,鲤鱼、鳖、鸵鸟、巨河狸、剑齿象、古板齿犀、晋南四不像、李氏野猪、古中国野牛等,多数属温带以北的动物,今已灭绝。从动物群生态分析,当时的晋南应是四季分明的疏林草原环境。

西侯度遗址发掘了32件石制品,包括石核、石片和石器,石器的类型有砍斫器、刮削器和三棱大尖状器等,属于粗大石器工具,是旧石器时代古人类使用的传统工具,后来逐步发展演变进而形成华北旧石器时代的两大传统工具之一,考古学家称之为“大石器传统”,“西侯度人便是大石器传统的开山之祖”^②。

从西侯度人石器的打制技术来看,他们已经采用了锤击、碰砧、砸击的三种方法,用这些方法从石材上获取石片,再将这些石片加工成石器,考古学家称这为“石片文化传统”。“从目前已发现的材料来看,中国境内旧石器时代的石器基本上都是属于石片文化传统”。“根据西侯度石片文化的出现,石片技术以中国为最早是可以肯定的,至少说根据我们目前所查阅到的资料是如此”^③。这就是说,西侯度的石片文化,为探索人类石片文化的起源提供了重要的依据,从而也证明了中国是

① 陈哲英:《山西旧石器时代考古综述》,《山西旧石器时代考古文集》,山西经济出版社,1993年。

② 李元庆:《三晋古文化源流》第51页,山西古籍出版社,1997年。

③ 贾兰坡等:《西侯度文化遗存》,《山西旧石器时代考古文集》,山西经济出版社,1993年。

世界上最早应用石片技术的国家。

还有两件带有切割和刮削痕迹的鹿角化石，“一件的角表面有条断面呈‘v’形的沟槽，可以肯定是人工用锐利的器物切割或刮削出来的；另一件角则有很清楚的刮痕，推测当时人类可能会制作骨器了”^①。

被火烧过的兽骨、鹿角和马牙化石，是西侯度发现的最为引人注目的一类文化遗物，它证明西侯度人当时已经开始用火。五、六十万年前曾经生活在北京周口店的“北京人”也使用火，但在北京人用火的遗迹中发现有成堆的灰烬，不使火到处蔓延。这说明北京人不仅已经使用了火，而且还懂得用篝火的方法保持火种，以控制火的使用，也就是已经初步认识和掌握了火的一般规律，可见绝不是处于用火的起步阶段，在此以前，肯定还走过了十分漫长的用火道路。西侯度人用火遗迹的发现，又把中国古人类用火的时间向前推移了 100 多万年，这不但是迄今所知中国人类用火的最早记录，也是世界上人类用火的最早记录之一^②。

西侯度文化是迄今所知在黄河流域所发现的最原始的文化，它奠定了以后在华北地区居主导地位的旧石器文化发展基础。虽然，这里至今尚未发现古人类骨骼化石，还不可能对西侯度人予以具体描述，但可以展望，随着考古发掘的不断深入，一旦有了人类化石发现，将会“在人类起源问题上可以做出十分可贵的贡献”，也将“会使我们对这一文化的面貌认识的更清楚”^③。

2. 匭河文化 匭河遗址位于芮城县风陵渡西北约 7 公里的匭河村一带，距西侯度村约 3 公里，是山西地区又一有代表性的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址，距今约六、七十万年，地质时代为中更新世。

匭河遗址发现有象、野猪、鹿、马、对丽蚌、水牛等大量的动物化石，动物群的生态表明当时晋南的气候比现在更加温暖湿润。

①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考古四十年》第 3 页，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 年。

② 李元庆：《三晋古文化源流》第 52 页，山西古籍出版社，1997 年。

③ 贾兰坡等：《西侯度文化遗存》，《山西旧石器时代考古文集》，山西经济出版社，1993 年。

匭河遗址发掘的石制品,1962年出版的《匭河》一书报道有138件^①,以后经过多次发掘,又发现了一百余件。从石器的类型和打制来看,匭河人继承了西侯度人的石片文化和粗大石器传统。当年西侯度人所使用的刮削器、砍斫器和三棱大尖状器等粗大石器工具在匭河也同样发现,但打制技术明显有所提高。这些石器也主要是由石片加工而成,大多还经过两次加工,就是对用钝了的刃口再进行修整,大大提高了石片的利用率。其中的三棱大尖状器是匭河人的代表性工具,它是由西侯度人开创,经过匭河人发展,到了丁村人就形成了“大石器传统”,被考古学家命名为“匭河—丁村系”,其典型器物便是三棱大尖状器,这充分说明匭河石器在华北旧石器发展中举足轻重的地位。

匭河遗址中还出土了小尖状器和石球两种石器工具。小尖状器是匭河文化中比较精致的石器工具,属于匭河人的一项发明。石球加工比较粗糙,重量在100克以上,主要作为狩猎用的投掷武器,在当时是很进步的一种石器工具。

匭河文化还是一个分布密集、范围广阔、内涵丰富的遗址群。以匭河为中心的黄河沿岸,北自永济市独头村北沟,南至芮城涧口南沟,长达13.5公里的范围内,分布着17处时代相同、性质一致的石器和化石地点,这说明在晋西南地区的黄河拐角处,一直是我国早期人类生产生活的核心地带,已经形成了相当规模的原始人群落。

二、丁村文化与许家窑文化

1. 丁村文化 丁村遗址位于临汾市襄汾县丁村附近的汾河沿岸,距今约10万年,地质时代为晚更新世,是山西地区旧石器时代中期最为典型的文化遗址。

丁村遗址是迄今在山西地区最早发现人类骨骼化石的文化遗址。1954年发现了3枚人牙化石,两枚门齿,一枚臼齿,属于同一个体,大约为十二、三岁小孩。1976年又发现1块两岁幼儿的头顶骨化石。丁村人门齿呈铲形,舌面不如北京猿人复杂,顶骨壁较薄,其体质特征较

^① 贾兰坡等:《匭河—山西南部旧石器时代初期遗址》第68页,科学出版社,1962年。

北京猿人有明显进步。因此,丁村人与北京人以及蒙古人种有着亲缘关系,但比北京人更为进化,已经脱离了猿人阶段,是介于北京猿人和现代人之间的人类,属于人类学上的“早期智人”。

丁村遗址出土的石器分为石核石器和石片石器两类,石核石器有砍斫器、手斧和球状器,石片石器有砍斫器、刮削器、尖状器、三棱大尖状器、鹤嘴形尖状器等。在尖状器中,“以三棱尖状器为最特殊,称之为‘丁村尖器’,它是丁村文化中之代表石器”^①。“丁村尖器”代表了粗大石器的主要特征,它是丁村文化继承和发展了西侯度文化、匭河文化的粗大石器传统而进一步成熟的,由此形成华北旧石器文化发展序列中一脉相承的“大石器传统”。

丁村文化也是一个以丁村为中心,北起史村(今襄汾县城)南至柴庄,长达 11 公里的遗址群,先后共发现 23 处文物遗存点,其中,属于旧石器时代中期的有 16 处,可见这是丁村文化的主体部分。属于旧石器时代早期的有 6 处,考古学家称其为“前丁村文化”,并把它作为连接匭河文化和丁村文化的中间环节。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有 1 处,在丁家沟,这里不但发现了粗大石器,而且还发现了各种制作精致的细小石器,如雕刻器、圆底石镞、锥钻等。考古学家把这些细小石器所代表的文化称作“丁家沟文化”,“又可称为‘前下川文化’,即下川文化是由‘丁家沟文化’演进而来的”。这说明,这类细小石器,在我国华北旧石器文化形成“小石器传统”的历程中起了重要的先导作用^②。丁村文化这种分布密集、范围广阔、年代跨度大的显著特点,在中国和世界范围都属罕见,正如裴文中、贾兰坡教授所说:“无论在中国和在欧洲,从前都没有发现过类似的文化,它是在中国黄河流域中下游、汾河沿岸生活的一种人类所特有的文化。”^③

2. 许家窑文化 许家窑遗址位于大同盆地北部阳高县许家窑村,距今约 10 万年,地质时代为晚更新世,是山西地区旧石器时代中期又

① 裴文中等:《丁村旧石器》,《山西旧石器时代考古文集》,山西经济出版社,1993 年。

②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考古四十年》14-20 页,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 年。

③ 裴文中等:《丁村旧石器》,《山西旧石器时代考古文集》,山西经济出版社,1993 年。

一典型的文化遗址。

许家窑遗址是迄今山西地区发现人类骨骼化石最多的一处文化遗址,人体化石多达 20 件,有颌骨、枕骨、顶骨、臼齿等,分别属于 10 多个不同的个体。许家窑人的体质特征,有些与北京猿人非常相似,有些比北京猿人先进,而又落后于现代人,因而许家窑人和丁村人一样,是介于北京猿人与现代人之间,也已经进入了古人或早期智人阶段^①。

许家窑遗址的石制品极为丰富,数量相当大,先后共获得 2 万余件,包括石核、石片和石器。石核最小的仅重 9 克,最大的也不过 500 余克。石片最大的 1 件也仅重 120 克,绝大多数在 30 克以下。石器包括砍斫器、刮削器、尖状器、雕刻器、石钻、石球等各种类型,几乎都是加工精致的细小石器,最小的仅 1 克,粗大石器非常少见。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石球,石球在匭河遗址和丁村遗址中都有发现,但为数不多,在许家窑遗址共发现石球 1100 多个,这么多的数量在国内外都属罕见。石球最大的重量超过 1500 克,直径超过 100 毫米,最小的重量不足 100 克,直径在 50 毫米以下。小的石球可能是狩猎工具“飞石索”上的弹丸,大的石球可能是一种投掷武器^②。

很明显,许家窑文化的细小石器特色很显著,这与西侯度、匭河、丁村文化的粗大石器传统形成鲜明的对照,它属于华北地区旧石器文化两大传统之一的“小石器传统”。这一传统是由旧石器时代早期的北京人文化所开创,至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山西峙峪文化而定型,考古学家把它命名为“北京周口店第 1 地点—峙峪系”,又称“北京人文化—峙峪文化”。由此可见,“许家窑文化在细石器技术传统上是北京人文化和峙峪文化之间的重要环节,也可以说是重要的桥梁”^③。这就是说,许家窑文化的细小石器,在我国华北旧石器文化的小石器传统系列中处于承前启后的地位。

① 贾兰坡等:《阳高许家窑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考古学报》1976 年第 2 期。

② 贾兰坡等:《许家窑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 1976 年发掘报告》,《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79 年第 4 期。

③ 贾兰坡等:《阳高许家窑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考古学报》1976 年第 2 期。

三、峙峪文化与下川文化

1. 峙峪文化 峙峪遗址位于朔州市峙峪村附近,距今约 2.8 万年,地质时代为晚更新世,它不仅是山西地区,而且也是中国旧石器时代晚期最具代表性的文化遗址之一。峙峪遗址的石制品,数量庞大,种类繁多,加工精致。在发现的 2 万余件石制品中,大型石器极为罕见,几乎都是小型石器,有刮削器、尖状器、雕刻器等。峙峪人制作石器的技术和水平明显进步,已经发明和使用间接打击法这一新的打制技术。所谓的间接打击法,就是利用一根带硬尖的棒状物对准石材的台面边缘,用石锤敲击棒的后端,以剥取石片,以便加工成各类小型石器工具,这在当时是一种比较先进的技术。

在峙峪文化的小石器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石镞、斧形小石刀和扁圆形钻孔装饰品等,这些具有较高工艺水平的精美器物,最能表现峙峪文化的特色。石镞的出现,说明峙峪人已经掌握了弓箭的制作和使用技术,狩猎水平已达到了一定的高度。斧形小石刀是一件加工精致、小巧美观的工具,可以安装镶嵌在木柄或骨柄上使用,这是峙峪人发明的一种复合工具,代表了峙峪文化的进步性。“以前,在我国旧石器时代遗址未曾发现过这一类型的石器”^①。钻孔装饰品表明峙峪人已经掌握了石器的磨制和钻孔技术,由打制技术跃进到磨制技术,意味着古人类将要由漫长的旧石器时代跃进到新石器时代。

峙峪文化细小石器的文化风貌,说明由北京人文化所开创的华北旧石器文化的小石器传统,经过许家窑文化的发展,到峙峪文化已经成熟。因此,峙峪文化是华北旧石器文化小石器传统链条上的重要环节。

峙峪遗址还出土有 1 块晚期智人的头骨化石、大量的动物化石和被人工击碎的兽骨片。在哺乳动物化石中最大的种类是野马和野驴,野马至少有 120 个个体,野驴有 88 个个体,很明显,这两种动物是当时人类猎取的主要对象。狩猎专门化的倾向,射程远、杀伤力强的弓箭的

^① 贾兰坡等:《山西朔县峙峪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山西旧石器时代考古文集》,山西经济出版社,1993 年。

出现,都说明峙峪人的狩猎技术已发展到新的高度。

2. 下川文化 下川遗址位于晋城市沁水县下川附近,距今约2万年左右,地质时代为晚更新世末期,它不仅是山西地区,而且也是中国旧石器时代晚期最具代表性的细石器文化遗址之一。

下川文化是一个分布广阔的遗址群,散布于中条山主峰历山东麓的山间盆地边缘,地跨垣曲、沁水、阳城三县,近20个地点,出土石制品上万件,因下川发现的石器遗存最为丰富而被命名为“下川文化”。

下川文化总的特点是细小石器与粗大石器并存,细小石器是它的主体。细小石器种类繁多,器型复杂,除了通常所见者之外,还有些异常精致、工艺水平相当高的附加木柄的复合工具,如扁底三棱尖状器,琢背小刀、锯、锥、钻等,石镞也比峙峪遗址多。琢背小刀是下川文化的典型器物,刀背钝厚,刀刃锋利。小型的三棱尖状器是制作最精细的微型尖状器,长不过2至3厘米,宽1厘米左右,有尖有刃,异常锋利。下川文化的细石器代表了旧石器时代石器制作工艺的最高水平,在小石器传统中具有典型意义,生产力由此得到进一步的提高,社会经济开始了新的飞跃,并为新石器时代的到来准备了条件。

下川文化细小石器与粗大石器并存,这与丁村遗址群的“丁家沟文化”极为相似,说明“下川文化是由‘丁家沟文化’演进而来的”^①,两者之间有着文化传承关系。下川文化的粗大石器,最为引人注目的是石磨盘、石锤、铤形器、带锯齿的石镰刀等,这些生产工具可能与原始农业的出现有关。有些考古学者认为,石磨盘的发现是“旧石器时代晚期采集天然谷物加工成粮食的信息,使我们看到由原始采集经济向原始农业经济过渡的先兆”^②。“研磨盘在下川文化中的出现,代表了我国黄河流域粟作文化的先声”^③。

下川文化的出现,已经预示了新石器时代的即将到来。

①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考古四十年》第26页,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

② 黄崇岳:《从出土文物看我国原始农业》,《中国农业科学》1979年第2期。

③ 卫斯:《试论下川遗址出土的研磨盘在我国北方粟作文化起源中的历史地位》,《山西文物》1986年第1期。

从旧石器时代早期的西侯度文化,到晚期的下川文化,反映了山西地区旧石器时代文化自成序列的发展演变历程,昭示了远古时代的山西有着极其丰厚的文化积淀,也呈现了山西南部和北部两种不同的文化风貌。“南部地区的粗大石器传统和以采集业为主的经济生活方式,一步步发展演变为萌芽状态的原始农业生产工具和原始种植业经济,这是这一带地区后来成为我国古代重要的农耕文化区的历史先声;北部地区的细小石器工具和以狩猎业为主的经济生活方式,则预示着这一带地区必将进一步发展成为我国古代游牧文化区的重要基地”^①。这样的古文化特点,对于塑造三晋文化所具有的中原农耕文化与北方游牧文化兼容并蓄、交相辉映的特质起到了重大的影响。

第二节 新石器时代

至少在距今1万年以前,中国人的历史进入新石器时代,与地质学上的第四纪全新世大致相当。新石器时代是人类氏族社会发展繁荣的阶段,这一时代的基本特征:第一,结束了以采集和捕获猎物为主要生活来源的时代,发明了原始的农业和畜牧业,这表明古人类已经由被动依赖自然的攫取经济跃进到主动改造自然的生产经济。第二,石器工具的制作由打制跃进到磨制。第三,手工业开始产生和发展,尤其是陶器、纺织的制作和使用。第四,村落及建筑大量出现。第五,宗教在人们的生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第六,文化、艺术有了一定的发展。

这一时期,山西的文化遗存十分丰富,分布也较为广泛,先后总共发现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1600余处^②,这些遗址的文化年代前后衔接,一脉相承,形成了一个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序列。

同时,山西新石器文化发展不平衡的特点也十分显著。从纵向角度看,新石器时代早、中、晚三个阶段文化发展很不平衡。早期文化遗址仅发现武乡县石门乡牛鼻子湾、翼城县枣园和闻喜县坡头等30余

^① 李元庆:《三晋古文化源流》第79页,山西古籍出版社,1997年。

^② 山西省史志研究院:《山西通史·先秦卷》第44页,山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

处。中期相当于考古学上的仰韶文化时期,文化遗存比较多,“每个盆地及其周围包括有的山地均有该时代遗址的分布”^①。晚期相当于考古学上的庙底沟二期及龙山文化时期,文化遗存更加广泛密集,星罗棋布,各大小河川的河谷地带和山前丘陵地区均有分布。这种不平衡的趋势,表明了随着时代的不断向前推进,其内容越来越丰富,分布越来越广泛而密集。从横向角度看,各个地区之间的新石器文化发展也很不平衡。大体上说,南部地区的新石器文化遗存数量多,内容丰富,分布广泛;其次是中部;比较薄弱的是北部和晋东南地区。这两方面的不平衡状况,除了由考古工作本身进展的不平衡所致之外,自然地理环境的不同也是造成这种不平衡的主要因素之一。

一、枣园文化

枣园遗址位于翼城县枣园村,总面积约为2万平方米,距今年代大约7000—6400年之间,出土有大量的陶器和少数生产工具。陶器中泥质陶约占60%,夹砂陶占40%,泥质陶器主要有小平底的各类钵、折沿盆、敞口盆、鼓肩小口壶、溜肩小口壶、蒜头壶等,夹砂陶器主要有折沿鼓腹罐、侈口鼓腹罐、折沿直腹罐等。生产工具主要有用于农业和纺织的陶错、石刀、石磨棒、陶纺轮等。枣园文化的发现和研究,不仅将山西地区的新石器文化推到了7千年以前,更为重要的是,对仰韶时期半坡文化和庙底沟文化的关系提出了新的看法,半坡文化和庙底沟文化不存在谁发展为谁的问题,而是地域相邻、互为影响的两支考古学文化,枣园文化是庙底沟文化的前身^②。“庙底沟文化正是以枣园遗址为主体,在与周边文化的交流、碰撞中,产生出的一支独具生命力的考古学文化”^③。

①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考古四十年》第58页,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

② 田建文等:《晋南地区新石器时期考古学文化的新认识》,《文物季刊》1992年第2期。

③ 杨国勇:《华夏文明研究:山西上古史新探》第4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

二、东庄村文化和西王村文化

仰韶文化因1921年首先发现于河南澠池的仰韶村而得名,它是黄河流域分布十分广泛的一种新石器中期的文化,反映了母系氏族社会繁荣至衰落时期的文化成就,距今约7000—5000年。按照文化内涵和分布区域,仰韶文化又分为西安半坡、临潼姜寨、河南陕县庙底沟、安阳后岗等类型。山西处于仰韶文化的中心区域,分布也十分密集,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仰韶文化东庄村类型和西王村类型。

芮城东庄村文化遗址是属于仰韶时代早期的文化遗址,相当于“枣园文化”晚期。发现有圆形半地穴式的房址、储藏食物的窖穴、烧制陶器的窖穴;石斧、石镞、弹丸、纺线轮、骨箭头、骨笄、外表绘有黑色三角形图案和鱼形花纹的陶器等;还发掘墓葬5座,其中两座多人二次合葬墓、两座单人墓葬、一座小孩瓮棺墓。这些文化遗存,表明各种器物的制作技术已经有了较大的提高,外表精美,质地多样;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处在母系氏族社会,氏族内分为若干母系家庭。东庄村遗址的文化因素大部属于仰韶文化的半坡类型,也有一少部分庙底沟文化的因素,传统上认为是处于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向庙底沟类型过渡的中间环节。

芮城西王村文化属于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学术界一般都将庙底沟文化视为山西地区仰韶时代中期的文化”^①,因此,西王村遗址属于仰韶时代中期的文化遗址。庙底沟文化在山西的分布范围很广,全省基本上都在其覆盖范围之内,其中心在南部,最典型的的就是西王村遗址。西王村遗址出土有石刀、石铲、陶纺轮、骨针、陶盆、陶碗、陶釜、陶罐等生产和生活用具,陶器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彩绘陶器,色彩有黑、白、红三色,图案多为弧线和圆点等几何形线条组成的花卉或禽鸟,可见当时人类审美已经有了几何形体观念,生产和生活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

山西仰韶文化晚期的遗址也多有发现,晋南的重要遗址有:芮城西王村、夏县东下冯、垣曲古城东关、侯马东呈王等,其文化面貌比较一

^① 山西省史志研究院:《山西通史·先秦卷》第53页,山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

致,仍可纳入庙底沟文化系统。遗存主体仍为尖底瓶、盆、夹砂罐,但彩陶锐减。晋中以太原义井、太谷白燕为代表,文化面貌与庙底沟文化差异很大,喇叭口双耳平底壶取代了尖底瓶,彩陶为红彩或黑彩,且数量较多。晋西北遗存类似于“义井文化”。晋东南有可能被河南安阳“大司空村文化”所覆盖。同整个中原腹地一样,山西地区在仰韶文化中期形成的大统一局面,开始走向破裂^①。

三、陶寺文化与中华文明的探源

龙山文化因1928年首先发现于山东章丘的龙山镇而得名,它遍布于黄河流域以及更广阔的地区,反映了父系氏族社会的文化成就,距今约5000—4000年,在考古学上相当于新石器时代的晚期。山西龙山文化分布广阔,已发现遗址100余处,考古学家按其地域和文化内涵的差异,将山西地区的龙山文化大致分为晋中、晋南、晋西南和晋东南四个类型。山西龙山文化以1978年发现于襄汾县的陶寺遗址最为丰富和典型,因其个性特征鲜明被称为“龙山文化陶寺类型”。

陶寺遗址位于襄汾县城东北约7.5公里的陶寺村南,面积约300万平方米,距今约4500—3900年^②。陶寺遗址丰富的文化遗存,对于探讨中华文明的起源具有重要的意义。

陶寺遗址发现了城址遗迹,有陶寺早期小城、中期大城和中期小城,城邑街区屋舍、宫殿群落、祭祀建筑、墓葬区、观象台、水井、道路和仓储设施等不仅有,而且规模大、代表性强,这在龙山文化中是非同寻常的。“从这些城址遗迹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城邑的建筑规模和宏伟气象,特别是各种标志性建筑,如宫殿、祭坛、天象台,以及仓储区、墓葬区、街市区和道路等遗迹的出土,更说明陶寺城址在当时不仅是典型的城邑,而且是一座气势宏大的‘王都’。由此可以证实,尧确实是建都平

① 田建文:《山西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问题》,《汾河湾—丁村文化与晋文化考古学术研讨会文集》,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6年。

② 《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第520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